

温州改革发展研究丛书

• 陈福生 主编

和谐

温州社会变迁历程

• 王尚银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和谐

温州社会变迁历程

● 顾 问：万 斌
主 编：陈福生
执行主编：任映红 牟德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谐：温州社会变迁历程 / 王尚银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8

(温州改革发展研究丛书 / 陈福生主编)

ISBN 978 - 7 - 80208 - 835 - 1

I. 和… II. 王… III. 社会变迁—研究—温州市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5763 号

书 名：《温州改革发展研究》丛书：和谐——温州社会变迁历程

出版人：董伟

主 编：陈福生

作 者：王尚银

责任编辑：钟秋菊

封面设计：幻像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人民日出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65369530

编辑热线：(010)65369525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大地印刷厂

开 本：880 × 1230 1/32

字 数：290 千字

印 张：12.25

印 数：1000(套)

印 次：2009 年 8 月 第 1 版 2009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08 - 835 - 1

定 价：118.00 元(全四册)



总序

陈福生

温州在改革开放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全市面积 11783.5 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是海防前哨，时时刻刻要准备打仗。当时温州的整个经济环境是“三少一差”，即人均耕地少，国家投入少，资源利用少，交通条件差。解放后前 30 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只有 6.55 亿元，600 多万人口在人均只有 0.4 亩的耕地上搞饭吃，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温州人也试图改变贫穷状况。早在 1956 年，永嘉县燎原社在全国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实行“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产量责任制到户”。一时间，舆论哗然，遭到批评，第一次“包产到户”的改革就被扼杀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温州引起了中国和世界的关注。温州人的创造活力演绎了生动无比的史诗般的活话剧，推动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的历史性跨越。30 年间，温州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从 1978 年的 13.2 亿元增至 2008 年的 2424 亿元，增长 180 倍。著名的经济学家钟朋荣教授说：温州几十年的发展等于亚洲四小龙的 35 年，等于西方国家的 100 年。温州人创业的传奇和创新的故事，也屡屡为国人所津津乐道。“一座普通的城市成为一个时代的信仰”。

温州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和经验。

一、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温州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调动了人们从事个体、私营经济的积极性。温州在这方面的发展首先走在全国的前列。1979年，温州市为了解决城市居民生活用品问题，试办了农副产品交易市场。1983年为解决迅速发展的城镇个体工商户经营场地和产品销售问题，试办了城区铁井栏、木杓巷等小商品市场，创建了妙果寺工业品市场，这在全国都是先走一步。1986年9月，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通过了递交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提出温州的试验带有“投石问路”的性质，试验的内容、范围、方式、步骤可以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壮大和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逐渐形成了民营企业、民间市场体系与政府干预的有机结合和功能互补，逐步建立起明晰的、排他性的以非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产权制度和所有制结构，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使温州从一个很不起眼的中小城市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市场经济重要发祥地。

温州在改革开放中不仅走在全国的前列，而且，温州的改革尝试了中国改革的一切内容和形式。温州人善于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只要认真仔细盘点一下，几乎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进程的每一步、每一个领域，都可以听到温州人的声音，看到温州人的脚步。温州人正是依靠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苦干实干的创业精神、精明能干的市场竞争精神和自强自立的自力更生精神，造就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有众多的声音。有的总是从姓“资”姓“社”的摹本中确认中国改革内容：社会生产和分配应该是怎样，文化是怎样，政治组织是怎样，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应该如何，其实质都是在对改革开放评头论足；也有的主张，只要把握社会发展指出大方向和基本规律，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任由群众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合力增加社会福利，形成自发扩张秩序。邓小平同志就认为，我们既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杜润生在评价温州改革进程和温州模式的形成后指出，“历史表明，在自发秩序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一般性规律”。^①

改革就是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解决当前主要矛盾。创造性的历史活动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必然受到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温州人民，也必然要从既定的现实出发，从现有的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出发，从 70 年代末的温州现状出发，把握温州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特定客观条件。

第一，以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为起点，把改革引向全方位。温州充分利用农业资源，让它们在既有的条件下创造更多的生活消费品。温州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开始，打破大锅饭，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创造更多的农业产品。最初的改革不仅解决了人民群

① 杜润生：《解读温州经济模式》，《理论参考》2002年第7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3页。



众的基本生存，带动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而且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庞大工程也开始启动。

第二，凭借传统的生产技术资源，寻找冲破农业资源短缺的束缚，发展非农产业。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农业生产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因此，发展非农产业已成为经济腾飞的唯一选择。而从事受土地制约较小的手工业行业，这正是温州人的特长所在。温州各地都有许多带有历史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如制革、做鞋、理发、裁缝、弹棉花等各种手艺，还有瓯塑、瓯绣、剪纸、黄杨木雕等传统手工艺。这些产业受土地资源的约束较少，因而也就成了温州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首选途径。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温州施展多种手工业技能的极好机遇。通过组织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乡镇企业，一直发展到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块状经济，温州人民终于找到了经济发展的新路。

第三，在面临两难选择的条件下，利用已有的文化资源作为价值参照，来回应当前种种困惑。温州在历史上拥有较好的文化资源。早在南宋时期，就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和以孙诒让为代表的近代温州地方士绅，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这种文化资源熏陶和锻造了温州人民敢于从实际出发、不受主观偏见束缚的特殊品格，为温州人冲破农业生产的局限，转向更有发展潜力的工商业寻求谋生之路提供了理性的价值参照。哈耶克说过，“作为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规则系统，必须是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① 在改革过程中，由于人们对于市场经济有着许多误解和偏见，把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因此，市场交易活动在改革初期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而社会需求的短缺又使得市场交易具有较高的回报和效益。在这种两难境地中，传统的浙南事功学派的价值取向，无形中支持着人

^① 转引自辛鸣著：《制度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们顶住政治风险而追求实际的经济利益，毅然选择市场体制，在建立市场经济方面先走出一大步。

二、温州人的主体积极性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充分体现

凡是论及温州的发展必然会论及温州人。众多解读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专著，实际都是关于温州人创业的“故事集”，它们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温州人的主体性。

温州最初的家庭工业是利用国有、集体企业废料或边脚料加工成小商品。温州经济发展的起点是那么低，甚至还常常被许多理论家嘲笑为是《资本论》中描述的手工作坊。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起点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人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方面表现在生产劳动中；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最大的方面是人作为生产劳动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首要的生产力，对于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从生产劳动的结果看，一切劳动的结果归根结底都是主体的客体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成功是人的功劳，失败是人的错误。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应当说，每一种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都潜藏着对人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如何实现，以及实现得如何，都取决于主体。同样的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在不同的主体手里，其作用及其大小是很不相同的。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和家庭企业的生产活动往往是自产自销，却具有商品生产经营所应拥有的全部权力，从而能自觉地面向市场，自主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温州市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劳动者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具体事务，仅仅是为经济活动提供市场的服务配套，由此促进温州人作为生产活动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也是市场经济建立所需要的共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提高劳动者的自主权，以此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温州人借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东风，乘势而上，温州的民营企业得到大发展，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其积极性、自主性和主动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再次得到充分展现。

温州人的主体性可以用“胆大”二字概括。几乎任何介绍温州的著述都会谈及温州人大胆创业的故事，诸如王均瑶包机，叶康松年近不惑弃官下海，在美国创办中国第一个农业跨国公司，王月香在延安地区承包开发 30 口油井，等等。在新世纪，在全国各地区的温州人开办 4 万多家企业；有 40 多万人在世界各地经商办企业；在温州本地有多家大型企业合作组成财团，谋求更大的发展。但是温州人的“胆大”绝不是盲目，他们在实践中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十分清醒，他们依靠市场引导生产，运用价格机制、利率机制、汇率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发展自己；他们也在市场中认识到“假冒骗”的危害，自觉提倡诚信经营、质量立市。

温州人的主体性为什么能够如此彰显？

第一，温州人具有务实精神。要解决生产力落后的现实困难，选择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必须从现有的条件出发，从温州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从脱离实际的主观愿望出发。温州人民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务实精神来探求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的。哪怕是生产小小的纽扣，做些简单的小商品，也不能随心所欲，也要有既得的物质条件和以往的技术特长作支撑，也要有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在改革的 30 年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务实精神内化为温州人民的自觉行动。只要有市场需求，就会有适合需求的产品问世，就会有温州人推销商品的服务。温州人民踏遍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说尽千言万语，想



尽千方百计，强烈的生存需求与务实的开拓精神相结合，造就了温州人民的新型品格。

第二，温州人重视改革和发展生产力。只有不断改革和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实际问题。解放生产力的改革进程是没有止境的，生产组织的制度创新是不断拓展的。温州人最早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采取既适合生产力水平又受群众拥护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生产组织方式，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温州人敢于试验、敢于探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自觉地调整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企业制度的不断创新，到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从农民建城镇到基层政务公开，不断地推进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个渐进改革的历史进程正是温州人民锐意改革进取的自觉意识的充分展现。

第三，温州人善于不断开拓进取。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关系逐渐创新的历史活动中，温州人的主观世界也经历了一个自觉的历史性飞跃。人们逐渐从盲目自发的求生愿望中升华，形成了自主自觉自立自强的良好品格。“他们的经济生产活动从跟着感觉走的自发状态中摆脱出来，开始理性地认识把握客观经济规律，有序地进行市场竞争，自觉地进行着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创造活动。”^①当年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们，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深感过去的成就已微不足道，纷纷重视理性决策、文化建设，尊重科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现在的温州，许许多多成功的企业家学会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商战本领。实践是锤炼人才的真正熔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产业战略。

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中国真正活

^① 张静蓉：《改革进程中浙江人民的主体自觉性》，《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8年第6期。

跃起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拥有 11 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提出，让创造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更是让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伟大的实践，造就着伟大的历史主体，当我们的改革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真正托付给亿万人民群众之时，这一伟大的历史主体便应运而生了。

三、温州正在走向科学发展道路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所谓“第一要义”是指在观念上是第一重要，在实践中则是第一要务。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①“发展”这个概念的基础性含义就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牢牢扭住”、“聚精会神”、“一心一意”。温州的发展就是扭住了这个中心。

温州是内源性发展，发展的根本力量来自人民的创业。经济建设的发展极大地实现和发展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极大地提升了温州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权利意识。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分析“以人为本”理念在温州的实践。

在温州，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是广大人民群众。温州总人口 700 多万，其中以资产 50 万元至 500 万元为主流的非公经济资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 页。



产主体达 120 万人——这还不包括当地收入不菲的垄断行业职员、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金融保险业、律师、文艺界人士、传媒从业者、教师等群体^①——这些基本属于一个类中产阶层。如果按两至三人的家庭规模，生活在这一阶层的人数就至少超过 250 万人，约占温州总人口的 40%。这是比较合理的“橄榄型”社会收入结构。在温州，创新创业的机遇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平等的。在 120 万非公经济资产主体中，个体工商户 23.7 万户，中小型民营企业家在本地的近 5 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地 4 万多人。现代经济学认为，从企业家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地位来看，可以把它视为生产要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管理和科学技术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管理能力，从企业角度来说，可以看作是综合运用生产力等其他要素的经营能力，这种经营能力最主要的体现者，就是企业家。^②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认为企业家作为“创新活动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不仅是为谋取额外利益而敢于冒险投资的创新者，而且具有特殊的心理特征，即具有显示个人成功的欲望，希望通过创新来证明自己不同凡响，具有一种“战斗的冲动”和“企业家精神”。也就是说，是否算得上企业家，主要视其是否能对客观环境作出创造性的或创新的反应，亦即干新事或以新的方式干事。^③ 温州的企业家群体不仅在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方面作出了创新，而且更加注重科

^① 2006 年，温州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采矿业（8479 元），住宿和餐饮业（13510 元），农林牧渔业（14382 元）；平均最高的三个行业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69677 元），金融保险业（60763 元），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45314 元）。垄断行业（电力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烟草、石油等等）未统计在内。参见金浩，王春光主编《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2 页。

^② 李贞芳：《论企业家供给的影响因素》，《经济评论》2002 年第 5 期。

^③ 参见 [美]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42—48 页。



技创新。目前，温州有“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累计29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00家，市级高新技术企业累计340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累计218家。在温州，人们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全国第一例“民告官”和“村民罢免村委会主任”事件都出现在温州；当温州皮鞋在杭州武林门广场被焚烧后，制鞋业的企业家们就自发组织行业协会，与杭州市政府交涉；当温州政府提出“诚信温州，质量立市”的口号时，是企业家们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当欧盟组织对打火机制造提出限定标准时，又是企业家主动诉诸法律。

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一个民间力量高度活跃、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层出不穷的地区，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既没有站在群众的对立面阻挡群众，也没有被动地跟在群众后面随波逐流，而是以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体察民情，尊重民意，启迪民智，依靠民力，从研究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全面落实到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

从改革开放以来到如今步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党的领导在温州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党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制定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确定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方面，始终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将其化作温州市政府的方针政策。党的执行力表现在依靠高度组织化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先进性作用，把各项方针政策层层落实下去。曾经在温州担任过市委书记的刘锡荣同



志就说过，多年前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温州领导是“无为而治”。确切地讲，在纯粹管制型的“计划经济”下，温州市政府的那一套确是“无为”的，如果“有为”温州早搞死了；但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温州市政府则是“有为”的。如贯彻党的改革开放各项政策，放手让人民群众发展家庭工业，又出台制订一系列发展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政策文件；同时坚持两手抓，在改革开放中既抓物质文明建设，也抓精神文明建设。抓邓小平理论学习，抓党的建设，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兴办教科文卫事业和社会养老统筹改革等；同时抓落实政策，化解历史矛盾，号召大家“俱往矣，团结起来，振兴温州”——这些都还是“有为”的。^①实际上，没有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统筹协调发展，温州也不可能有持续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

步入21世纪，温州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加自觉地积极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建设“平安温州”，要求统筹兼顾，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切实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统一起来，确保社会稳定，确保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经济运行稳健，确保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文化大市”，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面推进各项社会事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建设“法治温州”，要求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确保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供法治保障。建设“生态大市”，要求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以解决环境污染为着力点，扎实推进生

^① 沈绍真：《温州的发展是老区人民思想解放的伟大实践——访原温州市委书记刘锡荣》，《中国老区建设》2008年第6期。



态市建设。继续下大决心打好环境污染整治攻坚战，着力抓好环境整治，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把节能降耗摆到突出位置，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这些重大决策部署始终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大建设作为一个全面、系统、有机联系的整体，使之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回顾、总结温州的发展经验，归结到一条主线，就是温州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实际出发，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以“温州精神”为支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温州特点的发展路子。虽然，温州在前进道路上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问题和挑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温州一定能凭着敢为人先、务实创新的温州人精神，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同心同德谋发展的巨大凝聚力，保持改革开放以来一以贯之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良好精神风貌，努力克服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的健康发展之路！



前 言

本书主要研究温州的社会发展问题，因丛书中有关“温州文化”专题，故本书没有直接阐述温州文化教育与科技发展。不过，在分析问题时，为了保持系统性，也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

本书采用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沿着社会分化与整合的思路对温州的社会发展经验和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对温州的社会发展进行实证性的探究。具体来说，就是在总结温州社会发展成就与经验的同时，分析温州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从而探索解决问题的战略与对策。从书中，读者可以看到，温州的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温州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认为，需要从宏观视角来看问题，传统的将经济与社会发展分开来的研讨方法已经不适应实际的社会发展了。我们应吸纳系统论的思想，将视角从经济分系统扩展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分系统，并将它们“一体化”，即将各分系统联系为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社会大系统来考察，从宏观视角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本书就是秉承这一意旨而建立的理论分析框架。我们试图这样做了，但做得怎么样，这个问题就只有交给读者了。研究温州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社会发展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我们学识有限，缺陷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和
谐

——温州社会变迁历程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引用和参考了许多文献，吸取了其中许多观点，对此，都做了加注和说明，有部分观点已融合在本书的论述中，未一一指明，在此，特表示感谢和歉意！

作 者

2009 年春